

美國傳教士伯駕在華醫療事業及其影響

譚樹林*

19世紀西醫學知識的大規模輸入是促成中國醫學由傳統向現代嬗變的重要因素。近代來華新教傳教士無疑是該時期向中國輸入西醫學知識最主要的載體。特別是美國傳教士伯駕，作為奉派來華的第一位專職醫藥宣教士，他創辦廣州眼科醫局，發起成立中國醫藥傳教會，將西醫眼科及外科方面的先進技術傳入中國，創下了中國近代醫學史上的數項記錄，在中美醫學交流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醫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這基於宗教和醫學目的的一致性。醫學與基督教的聯繫尤為密切，猶太教的神子耶穌已負有傳教和治病兩大使命。耶穌認為，疾病乃人的罪性或精神因素所致，這就需要信仰上帝，因為信仰可以產生力量和奇跡，可以醫治百病與起死回生。《馬可福音》中記載了耶穌在迦百農等地“治療”許多精神病、麻瘋、癱瘓、盲人、血漏等病人的奇跡，說明傳教與醫學在生命拯救上具有同等重要



伯 駕（Peter Parker, 1804-1888）

性。正因如此，在基督教早期歷史上，施醫散藥被認為是引人入教一種常見的佈道方式。

在中國，儘管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等，自明末即踏足中土，且精通醫術者不乏其人，但醫療宣教方式的實施、西醫學知識的大規模輸入，卻是伴隨着19世紀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才開始的。而美國的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 1804-1888），則是被派往中國的第一位專職醫療宣教士。因此，伯駕被稱為在華“醫療宣教的先驅”。⁽¹⁾

*譚樹林，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外文化交流史及近現代國際關係史研究。

伯駕作為醫療宣教士被派往中國的緣起

概因醫學與基督教聯繫極為密切之緣故，有志於海外傳教的傳教士均十分重視學習掌握醫學知識。元代到大都（今北京）開教的方濟各會士約翰·蒙特高維諾（Jean de Monte Corvino）來華前曾學習過醫學。明末清初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主要為耶穌會士）中，精通醫學者為數更多。澳門主教卡內羅（Melchior Carneiro, 1515-1583）是第一位在中國建立西式醫院的葡萄牙籍耶穌會士，他於1569年在澳門建立醫人廟〔即拉法醫院（Hospital de S. Rafael），因位於白馬行路，今伯多祿局長街，澳門人稱之為白馬行醫院〕、發瘋寺〔即辣匝祿麻瘋院（Hospital de S. Lázaro）〕、仁慈堂〔即聖加割醫院〕三家醫院。它們的建立標誌着西方近世醫院制度開始傳入中國。據《澳門記略》等書記載：白馬行醫院已設內外兩科，看內科病要驗尿，以查病因。內外科已使用西藥進行治療，這是中國醫院最早使用西藥和化驗的文字記錄。

由於許多傳教士精通醫術，自然會導致部分西醫學知識傳入中國，而傳教士們的中文著譯則成為傳播西醫學的載體。意大利籍耶穌會士利瑪竇的《西國記法·原本篇》中“記含之室，在腦囊，蓋顛凶後枕骨下，為記含之室……”的描述，實際上說明了人體腦的位置和記憶的功能，實為神經學傳入中國之始。⁽²⁾另一位意大利籍傳教士艾儒略著有《性學摘述》，全書共八卷，其中卷四描述了人體的感官器官眼、口、鼻、耳及其生理功能。湯若望的《主制群微》共二卷，卷上“人身向微”記述了血液的生成、功用以及腦、腦神經等的關係。熊三拔撰有《泰西水法》六卷，其中第五卷論述了人體的排泄及消化等生理及其功能；一些傳教士還撰寫了關於人體生理的醫學專著，羅雅谷、龍華民、鄧玉函三人合作譯述的《人身圖說》介紹了呼吸、迴圈、神經、消化、排泄、生殖等系統；鄧玉函本人譯有《泰西人身說概》二卷，上卷介紹人的骨骼、肌肉、皮膚及迴圈、神經、感覺等系統，下卷介紹人體的

眼睛、耳朵、鼻喉、舌頭、行動器官、語言系統等八個方面的器官和組織，這是西方人體解剖學傳入中國最早的著作。法國傳教士巴多明曾將法國皮里（Pierre）的《人體解剖學》譯成滿文，但未刊行。⁽³⁾西方醫藥學也由傳教士輸入中國，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和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均對藥露的煉製方法及其效用有相當的介紹。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身染瘧疾，法國耶穌會士洪若翰、劉應用從印度寄來的西醫名藥金雞納霜（即奎寧，quinium，原產秘魯）治癒了康熙帝的瘧疾。康熙帝視金雞納霜為“聖藥”，賞賜給他的大臣和屬下，金雞納霜由此得到迅速傳播。康熙三十八年（1699），傳教士羅德先（Bernard Rhodes, 1645-1715）等用西藥治療康熙帝的心悸、唇瘡等病癥。⁽⁴⁾方濟各會士石鐸琢（Petrus Pinuela, 1650-1704）著有《本草補》，為西方藥物學傳入中國之始。

誠如著名醫史學家陳邦賢所說，儘管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中不少人懂得醫術，但他們祇是偶爾介紹而沒有大規模輸入西醫學，醫療活動僅限於宮廷，所以在當時的中國並未產生多大影響。⁽⁵⁾西醫學大規模傳入中國並真正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是伴隨着19世紀初基督教新教的傳入而開始的。

第一位來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很早就注意到醫學對傳教的重要性。像許多有志到海外的傳教士一樣，馬禮遜來華前就曾入倫敦聖巴多羅買醫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學習醫學，以備傳教之用。他曾向倫敦會請求做一名醫藥傳教士，但未獲批准。⁽⁶⁾抵達中國廣州後，他一再給倫敦傳教會寫信，敦促派遣醫生身份的傳教士來華，因為醫生是最不易引起中國人注意的最合適的人選。⁽⁷⁾馬禮遜在傳教過程中發現，為病人開處方、發藥品，能夠吸引那些好疑者注意福音啟示⁽⁸⁾，於是產生以醫學助傳教的想法。1809年，馬禮遜被聘為英國東印度公司中文翻譯兼秘書，這為他與公司醫生友好合作、實施醫療宣教提供了良機。1820年，馬禮遜與東印度公司醫生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合作在澳門開辦一家診所，並附有藥房，藥房中備

有中藥。他們聘請一位著名中醫和藥劑師相助應診和認草藥，便利親自觀察中醫中藥治療疾病的效果。它是 19 世紀早期瞭解中醫藥典的一個重要嘗試。⁽⁹⁾ 該診所專為貧苦人治病，馬禮遜每天早上在診所 1-2 小時，指導和幫助李文斯敦。關於這個診所，李文斯敦曾寫了一篇報告，刊登在《印支蒐聞》上，報告稱：

我很高興地報告，馬禮遜博士開設的診所已經做了許多好事，不少中國病人已得到醫治，已經有三百個治癒的病人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謝，其中一些病人是用西藥治好的。沒有一個病人死亡。到診所一起參加治療病人的那位著名的中醫也治好了許多病人。我可以作證，馬禮遜博士幸運地選擇了那位中醫負責這個診所的醫務工作。他是一位聰明和藹的中醫師，（……）來到馬禮遜診所治療的中國病人，大約有一半是屬於慢性病，肚子痛、胸痛和腸痛病，還有少數是慢性風濕性的病。還有很大比例的急性病，我們的中醫師稱之謂傷寒症。我所能列舉的症癥有發冷發熱、連續高燒、痢疾、間歇性和弛張性，以及風濕病等。⁽¹⁰⁾

從這個報告可知，李文斯敦認為馬禮遜診所的開辦已經證明醫藥事業是與中國社會友好交往最可靠的保證，因為“我們和中國兩方面都可以分享許多有益而實用的知識”⁽¹¹⁾。它的重要意義在於逐步改變了中國人對西醫學的偏見，由最初的拒斥轉向接納，為西醫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打下了基礎。馬禮遜診所實為基督教醫藥傳教之嚆矢。⁽¹²⁾

1825 年，李文斯敦不幸去世，而此時馬禮遜尚在英國休假未歸，診所被迫關閉。李文斯敦去世後，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在 1826 年被任命為東印度公司醫生。1827 年，在東印度公司的資助下，郭雷樞在澳門租賃了兩間平房開設眼科醫院。這是個慈善醫館，專為無錢看病的窮人免費治療，前往就診的人由東印度公司發給免費證明。⁽¹³⁾ 每天就診者有時多達四十人，除澳門外，也有一些鄉村農人前來就診。此舉深受中國人歡迎，

郭雷樞被稱為“中國人之友”。澳門眼科醫院存在的五、六年間，有六千患眼疾者得到治療。⁽¹⁴⁾ 1828 年，郭雷樞在美國醫生白拉福（Dr. H. Bradford）的協助下，又在廣州開辦一家診療所，以治療眼病、腳病及其它各種癥候，廣州外僑和中國人從此診所受惠良多。後來該診所由東印度公司外科助理醫生柯克斯（Dr. Richard Cox）和白拉福醫生共同執掌，大約持續至 1834 年關閉。⁽¹⁵⁾

馬禮遜、郭雷樞等在澳門和廣州倡辦的這些西式醫館雖非基督教會主辦，亦非馬禮遜主診，但誠如李志剛牧師所說，“惟其導致日後專業醫藥士來華不無宣導作用也”⁽¹⁶⁾。1827 年，美部會考慮建立中國傳教會時，決定派往中國的第一批兩位傳教士中，其中一位必須是醫生⁽¹⁷⁾，這可能與受到馬禮遜等人的影響有關。1830 年 2 月，美部會派往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抵華後，與馬禮遜相交甚密，傳教事業亦多受其指導。裨治文曾親眼目睹馬禮遜倡辦的這些西式醫院的成效。他在一篇文章中描繪了醫院典型的一幕：

每天凌晨前一小時，人們就可以看到病人、盲人、癩子——各個年齡的男女擁擠在診療所的門口。我們看到孤苦無助的孩子被醫護人員用肩臂夾着——或通常更多地是根據這個國家的習慣，抽打着年輕僕人的脊背來到這裡。我們看到年老的、失明的、衰老的病人“手持拐杖”，由他們的孫輩領着到醫院；那些條件優越的則坐着轎子前來。⁽¹⁸⁾

裨治文由此認為開設醫院作為一項基督教慈善事業，提供了把基督教傳給中國人的最好的機會，是贏得中國人好感以利傳教的最佳手段，因此他向美部會建議培養醫藥傳教士。當得知特里時牧師將離華去新加坡時，裨治文當即致函美部會，要求派遣來華替代特里時在廣州位置的傳教士必須是接受過醫學訓練的醫藥傳教士。他在 1833 年 12 月 26 日給美部會通訊秘書安德森的信中要求立即有一位能幹的醫生來接替特里時在廣州的位置，他說：



澳門眼科醫院院長托馬斯·柯立治博士 (Dr. Thomas Colledge) 與中國病人在一起 (油畫)
喬治·錢納利畫於約 1835 年 美國麻省薩勒姆皮伯第·伊賽克斯博物館藏

關於特里時將去新加坡，我完全同意；我請求他在這裡的位置應立即由一位能幹的醫生填補。至於《中國叢報》10月號提到的，你將會看到這片土地是多麼需要醫學人材。在以前的信中有關這個問題我已經提過，現在我們所有人都切望有這樣一個人到這裡來。他應當是一個第一流的眼科醫師，懂得所有皮膚方面的各種疾病。當他使病人痊癒、盲人復明時，他將會找到許多機會分發宗教書籍。⁽¹⁹⁾

裨治文的請求對促使美部會決定向中國派遣醫療宣教士所起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當然，美部會派伯駕以專職醫藥傳教士身份來華，除了希望他把醫療作為引領中國人皈依基督福音的佈道方式外，當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為在華美國傳教士提供醫療服務。據統計，自美部會成立以來，其派駐海外的傳教士已有四十五人死亡，五十五位返回，他們中有三十一人是由於他們本人或家庭成員的健康原因而被迫回國的。⁽²⁰⁾為了改變這種狀況，美部會採取了一些保護海外傳教士健康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培養一些既接受神學又接受過醫學訓練的傳教士，把他們派往各海外佈道站，去照顧他們的同伴。在1819-1834年期間，許多這樣的傳教士醫生被美部會派往不同的佈道站以照顧他們的同伴。⁽²¹⁾因此，對異教徒的“靈魂拯救”與保障同工健康的雙重需要，最終促成伯駕以醫療宣教士的身份被派往中國。

伯駕在華的醫療事業

伯駕在華的醫療事業主要有兩個方面，即開設廣州眼科醫局和發起成立中國醫藥傳教會。

一、開設廣州眼科醫局

廣州眼科醫局是19世紀中國境內第一所現代化的醫院，也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教會醫院，創辦者即為伯駕。

伯駕在新加坡的華人行醫所取得的成功，使他決定在廣州也開設一個類似的機構。而東印度公

司醫生皮爾遜、李文斯敦、郭雷樞及其他醫生在廣州和澳門的醫療活動的成功經歷，使伯駕確信中國人將會歡迎此類努力。1835年9月，伯駕從新加坡來華。甫抵廣州，就籌劃開辦診所。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後，伯駕在廣州十三行新豆欄街七號的豐太行，以每年500元的租金向行商伍怡和租得了部分房子，開設一家醫局，稱廣州眼科醫局。因位於十三行新豆欄街，故醫局又稱作“新豆欄醫局”。據說醫局入口處，還懸掛一個用中文書寫的“博愛醫院”(P'u Ai I Yuan)的牌匾。⁽²²⁾這座房子有三層，第二層的一間大的房間可容二百人候診，門診部和配藥部即設在這一層；第三層為手術室和住院部，住院部至少可以提供四十人住院治療。因此被認為是開設醫館最適合的地方。⁽²³⁾

廣州眼科醫局，顧名思義，以治療眼病為重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傳教士經過調查發現，中國人所患的各種疾病中，以眼病最多。⁽²⁴⁾而中國醫生素來缺乏治療眼科疾病的醫術，對眼科疾病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馬禮遜、李文斯敦都頗重治療中國人的眼病。郭雷樞則把1827年在澳門開設的診所逕稱澳門眼科醫院，這對伯駕後來開設廣州眼科醫局產生了直接的影響。⁽²⁵⁾而伯駕本人的醫學專長亦為眼科。事實證明伯駕選擇以治療眼疾是正確的，因為前來求診的病人中的確以患眼疾者最多。僅在第一季度，伯駕就醫治了四十七種不同的眼疾。除眼疾外，伯駕還以成功割除腫瘤著名，他曾為阿開（音，Akae）、王克經（音，Wang Ke King）、楊施（音，Yang She）等成功割除不同部位的腫瘤，並為包阿興（音，Po Ashing）實施了中國第一例自願截肢手術。當時，一位師從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學畫的中國人林呱（Lamqua），據說是伯駕高足關亞杜（Kwan A-to）的叔父，他被伯駕免費為中國人治病的行為所感動，自願免費為伯駕將某些病人的病狀畫下來，共達一百一十幅，其中三十多幅是腫瘤患者的畫像。這些畫如今都還存在，其中八十六幅保存在耶魯大學醫學圖書館（Yale Medical Library）。這些畫既給我們留下了伯駕曾經治療的病人的一幅幅生

動的病歷資料，同時由於這些畫都是採用西式人像畫法，又為我們瞭解西洋畫法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此外，醫院還診治了像尿道結石、乳腺癌、疝氣、聾啞等十三類疾病。所以，廣州眼科醫局實際上成為一家以治療眼疾為主要特色的綜合性醫院。眼科醫局開辦伊始，中國人對它抱着懷疑的目光。隨着病人被伯駕成功救治，醫院的名聲不脛而走，前來求診者日益增多。據統計，從 1835 年 11 月 4 日醫院開張到 1836 年 2 月 4 日，即第一季度共有 925 名病人在醫局得到治療，其中男病人 655 名，女病人 270 名。這一數位還不包括那些僅在醫局開藥的人。⁽²⁶⁾ 到 1837 年春天，每天就診的病人達二、三百人，最多的一天甚至達到六百人。由於醫院規模有限，對更多的申請者不得不拒絕。

伯駕診治的病人遍及各個階層，從清朝的封疆大吏到渾身長瘡的乞丐，從廣州當地人到外地慕名而來的人都有。伯駕深知，通過給官員治病，他們給其他人帶來的影響將會增加醫局的聲望。醫局開辦不過十七天，病歷表中就有幾位衙門的官員在內。一位姓馬的知府師爺，患白內障失明已七年之久，久治不癒。經伯駕動手術，一個月後復明。他十分感激伯駕，在送禮物被拒的情況下，他請人畫了伯駕的像“以便天天向他跪拜”，後來還寫了一首詩來歌頌伯駕。⁽²⁷⁾ 伯駕診治的清朝官員中最顯赫者當屬欽差大臣林則徐和兩廣總督耆英。1839 年，林則徐受命欽差大臣赴廣州查禁鴉片。因林則徐患有疝氣病，聽說伯駕的醫術高超後，本想請伯駕到官邸為其診療，但礙於身份，不便與外國人直接接觸，乃通過行商伍浩官向伯駕索取治療疝氣的疝帶和醫治鴉片吸食者的藥方，並請求伯駕將瑞士國際法學家瓦泰爾名著《國際法》一書中涉及戰事及其附帶的敵對措施，如封鎖、禁運等內容的若干段落翻譯成中文。伯駕在《中國醫藥傳教會 1839 年醫院工作報告》中對此事曾有詳細記載。⁽²⁸⁾ 伯駕間接治癒了林則徐的疝氣，同時又應允林則徐所求，將瑞士國際法學者瓦泰爾《國際法》若干章節譯為中文，成為將西方國際法譯介到中國的第一人。⁽²⁹⁾

伯駕還治癒了耆英的皮膚病。那時耆英任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他的皮膚病多方治療不能奏效，祇好一天幾次洗澡來減輕痛苦，皮膚病甚至影響到他的公務，耆英為此很沮喪。在耳聞伯駕能治癒多種疾病後，耆英有意請伯駕為他診治皮膚病。他最初是通過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向醫局求助，後來又派了僕人到醫局詢問有關他的疾病的性質。1843 年 10 月 2 日，顧盛使團向耆英遞交國書，伯駕作為使團的顧問和中文秘書出席，為伯駕提供了一個直接給耆英診治開藥的機會。伯駕問明病因，對癥治療，終使耆英的皮膚病得以根治。耆英非常感激，不僅多次在公開場合稱譽醫局，還向醫局贈送了禮物以及兩塊親筆提寫的匾：一塊寫着“妙手回春”，一塊寫着“壽世濟人”，落款均為：“耆宮保書贈伯駕先生”⁽³⁰⁾。不僅耆英本人，其隨從官員亦有多人到眼科醫局求診。

清朝官員到醫局求診，對眼科醫局特具意義。它不僅極大影響了中國普通民眾對西醫院的觀點，尤為重要的是消除了官府對醫局的懷疑，給醫局的合法存在提供了一定保障。眼科醫局開設之初，還害怕官府反對。伯駕的報告中特別提到，倘若清政府官員反對，醫院就得被迫停止。現在，許多清朝大員像林則徐、耆英等受惠於醫局，在各種公開場合以不同的精心構思的語言稱譽醫局，這無疑有助於提高醫局的聲譽和改變中國人對西醫學的看法。

1839 年 5 月，由於鴉片問題引起的中英關係日趨緊張，戰爭處於一觸即發之勢。鑒於此情勢，廣州眼科醫局被迫關閉。眼科醫局關閉後，伯駕的醫療活動並未終止，他在柯克思醫生和安德森醫生（Dr. Anderson）診所（此時二人已去澳門）接收病人，一直持續到 1840 年 6 月伯駕離粵赴澳門，不久返回美國。鴉片戰爭結束後，伯駕重返中國，1842 年 11 月 21 日醫局在原址再度開張。由於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戰敗，外人在華獲得更多的權益，前往醫局就診者人數驟增，有時一天要接待大約 1,000 人。⁽³¹⁾ 據統計，自開張至 1843 年 12 月 31 日，僅到醫局診治完全康復者就達 3,501 人。⁽³²⁾

1844年2月，顧盛使團來華與清政府商訂條約，伯駕被聘為顧問及中文翻譯，醫局被交由其高足關亞杜執掌。《望廈條約》簽訂後，伯駕雖多次擔任美國政府駐華臨時代辦，負責使館工作，但仍堅持履行醫生職責。直到1855年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公使，伯駕才最終離開醫局，完全投身於美國對華外交事務，這時接受過伯駕治療的病人已達53,000多人。⁽³³⁾

伯駕離開醫局後，接替他的為另一位美國傳教士嘉約翰。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廣州眼科醫局遭到焚燬而再度關閉。1859年1月，嘉約翰在廣州南郊增沙街購得一幢臨河房子為新址，重建醫局，建成後更名為博濟醫院。嘉約翰任博濟醫院院長四十四年，醫院獲得極大發展，在廣州一帶產生相當大的影響，成為19世紀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的教會醫院。該醫院一直存在到1949年。

這裡有一件史實須澄清：伯駕在1835年11月開辦的醫院名為廣州眼科醫局，伯駕向美部會提交醫療報告使用的名稱一直是廣州眼科醫局。1859年1月，嘉約翰重建醫局後，更其名為博濟醫院，此後始有“博濟醫院”之稱。然而，許多論著將伯駕在1835年11月創辦的醫局逕稱為“博濟醫院”，顯然是不正確的。

二、發起成立“中國醫藥傳教會”

廣州眼科醫局的成功，不僅體現在作為一個醫療中心解除人們的疾病痛苦，尤其重要的是，在傳教士們看來，醫療作為福音事業的從屬，它對福音事業的幫助是無價的。裨治文認為醫局除向中國人提供重要的醫療服務，還可藉此提高傳教士的聲望，為傳佈福音提供機會與場所，他說：

醫院不僅提供了為中國人做許多善事的機會，藉此表明“遠夷”的技能和善心，而且提供了許多非常好的時機開出倫理疾病的藥方。我們認為應採用這種方法，以使醫院永久存在下去。⁽³⁴⁾

因此，伯駕、裨治文和在廣州的其他西方醫生決定將醫院制度化、永久化。1836年10月，伯駕、郭雷

樞和裨治文籌劃後，發表了一個主要由伯駕起草的呼籲書，要求在中國建立一個機構，負責籌措經費，並向那些初到中國的醫藥傳教士提供幫助，以推進在華醫療事業。呼籲書說：

鑒於醫療實踐在中國人中有望產生良好效果的特殊利益，尤其將有助於引起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一種更加禮貌和友好的交往，向他們傳播歐美的藝術與科學，最終傳入我們的救世主的福音來替代現在仍統治着他們的靈魂的卑劣的迷信觀念。我們已經決定建立一個協會，叫中華醫藥傳教會。⁽³⁵⁾

關於醫藥傳教會的目標，呼籲書聲明如下：

第一、那些被派往中國的醫藥傳教士初到這個國家，就可以從這裡得到所需的幫助和資訊。

第二、通過這種方法，可以立即實施他們的服務，同時他們可以學習語言，以便他們在外國人不能自由前往的那些地方開展工作。

第三、我們不推舉委派單個人參與這項工作，但將接收和幫助那些由英國或美國為此目的而組成的傳教會派遣的醫務人員，因熟悉這個情形的特性，我們特別期望注意選擇具有適當資格的人。

第四、我們決定接受任何數額的捐款用於幫助這個目標，直到協會成立，花費它們將被認為是自私自利，所以，從事這項事業的那些人的工作不能延遲。⁽³⁶⁾

另外，呼籲書還告誡傳教士醫生這是一項無私的慈善事業，不能收取任何報酬。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838年2月21日，中國醫藥傳教會在廣州舉行成立大會。會上通過的決議描述了傳教會的章程和決定開展的工作的性質：

為了使在中國人已經開展的傳播合理的內科和外科援助的成就範圍更廣、持續更久，決定在廣州成立一個協會，名為中國醫藥傳教會；其目標就是鼓勵那些醫學專業的人們來中國，無償在中國人中開展醫療救治，提供醫院、藥品和服務



彼得·伯駕博士和他的助手關亞杜（Cuan A-to）在做一個眼科手術（油畫）
蘭官〔林呱〕約畫於 1839 年 美國國家肖像館藏

人員等通常的幫助，但是那些醫務人員的生計或報酬目前尚不在考慮之內。(37)

1838年4月24日，中國醫藥傳教會召開第二次會議，由伯駕、郭雷樞、裨治文三人起草的宣言，闡述了醫藥傳教會的目標和前景。宣言稱：

本會的目標，如同在成立大會上通過的決議中所指出的，是鼓勵在中國人中間進行醫療實踐並將贈予我們的科學、病例調查和不斷點燃我們的發現之光的益處提供一部分給他們。(……)我們希望我們的努力將有助於推倒偏見之牆，消除長期以來所抱的民族排斥情緒，並以此教育中國人，那些他們所歧視的人是有能力也願意成為他們的恩人的。(……)在為中國人做善事方面，我們的機會是很少的，但是在這些機會中，行醫是最傑出的。

行醫迄今已產生了滿意的結果，並將繼續下去。它是特別適用於中國的一種慈善方式。通常的傳遞資訊的方式不會引起中國人的尊敬，因此他們對我們的毫無理由的恐懼和懷疑一直未予改變。我們能夠消除那些恐懼，使他們知道西方國家的真實品質和心願。(……)我們稱呼我們的機構是傳教會，因為我們確信它將會推進傳教事業，我們需要傳教士充實我們的機構，他們必須擁有技能、經驗以及忘我的和崇高的道德品質。(……)還有其它好處，儘管它們屬於非常次要的一類，但不是沒有它們的價值。這些好處中，我們提到的第一個是通過醫療實踐可能導致中國醫學的科學化。(……)不需要列舉許多例證就可以說明的第二個好處是通過這種方法獲得的資訊，對傳教士和商人都具有極高的價值。(……)但是通過此類與人民的交往，如同這些醫院將提供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得悉真實情況，那些我們現在有興趣要問的許多問題，也可以得到回答。因為病人通常對他的醫生是坦誠相待的，儘管他可能有意向任何其他的人隱瞞事實或讓人曲解他的陳述。又一個好處將是讓中國年

輕人接受醫藥學各科的教育。事實表明，中國的父母並非都不期望將他們的兒子放在我們的醫院，如同已經在廣州醫院接受教育的三個年輕人。那些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將分散到整個帝國。(……)(38)

從宣言可知，中國醫藥傳教會鼓勵傳教士在中國人中行醫的最終目的在於借此推進傳教事業，同時也將培訓中國西醫人才作為其職責之一。

中國醫藥傳教會成立後，逐步開展醫療活動。廣州自然成為傳教士從事醫療活動的中心，除了已開設的廣州眼科醫局，又增設六個診療所，涉及外科、耳科、皮膚病、婦女及兒童疾病專科，其中許多發展為今天的醫院。1838年6月，醫藥傳教會又斥資對廣州眼科醫局進行整修，鴉片戰爭使廣州的醫療事務一度中斷。戰爭結束後，伯駕從美國回到廣州，在醫局舊址重開醫院。後由嘉約翰執掌，更名為博濟醫院。除上述外，1848年美國公理會教士波乃耶(Dyer Ball)醫生在城內公理會教堂開一診所，1851年美國長老會醫生哈珀(Andrew Patton Happer)在廣州開辦惠濟診所。

英國傳教士在廣州的醫療事業，以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33)於1848年在廣州西關外金利埠建立的惠愛醫院最著名。合信1839年受倫敦會委派來華，最初在澳門協助維魏林從事醫務。據容閱《西學東漸記》記載，容閱少年時即在澳門跟隨合信在醫院工作過兩個月，後經合信介紹進入馬禮遜學校學習。1848年倫敦會為擴展在華傳教事業，決定在廣州西關外金利埠建立惠愛醫院，這實際上是繼廣州眼科醫局後在廣州開設的第二間西式醫院。1848年6月開館，合信主持這家醫院。前來求診的病人極多，據載1850年全年病人總數竟達25,497名。(39)梁發曾負責在該院傳教工作。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廣州人民激於反英義憤，將該醫院搗毀。(40)

醫藥傳教會的醫療工作並不局限於廣州，在澳門、香港、舟山、上海、北京、寧波、廈門等地亦開展起來。1838年7月5日，伯駕在澳門建立的

醫院開業，這是一個能容納二百人就醫的醫院。三個月間，就有七百個病人得以治癒。⁽⁴¹⁾ 1838年10月，伯駕返回廣州，這家醫院由於缺乏醫生而被迫關閉。1839年初，倫敦傳教會派遣的醫藥傳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到達澳門。受中國醫藥傳教會派遣，1839年7月1日，雒魏林在澳門重開醫院，他因此也成為由醫藥傳教會資助開展醫療工作的第一位醫生。由於中國官府干涉，醫院於8月13日被迫關閉。雒魏林離開澳門前往巴達維亞，在倫敦傳教會傳教士麥都思（W. H. Medhurst）的指導下學習中文。在他離開期間，裨治文在美部會戴華爾（William B. Diver）及英國倫敦傳教會合信的協助下接管這家醫院。1840年6月，雒魏林重返澳門，合信不久離開另開醫館。雒魏林於8月

1日重掌醫院。⁽⁴²⁾ 因雒魏林隨英軍到舟山，醫院於1841年6月30日再度關閉。1842年3月，曾陪同伯駕返美的中國青年金松（Chin Sung），協助澳門醫院重新開張，8月15日做了一例割除乳腺癌手術。⁽⁴³⁾

鴉片戰爭後，中國醫藥傳教會的醫療事業由廣州、澳門擴大到香港及各通商口岸，甚至到北京。中國醫藥傳教會對中國近代醫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誠如魏外揚所言，中國醫藥傳教會“雖不如以後的‘中國博醫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那樣在統一醫學譯名、推廣醫學教育等方面卓然有成，卻在聯繫早期的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能。”⁽⁴⁴⁾ 據統計，在1851年前先後來華的醫藥傳教士有：

姓名	所屬教會	來華年份	服務地區
波乃耶 Dyer Ball	美部會	1838	新加坡、香港
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倫敦會	1839	舟山、上海
戴華爾 William B. Diver	美部會	1839	澳門
合信 Benjamin Hobson	倫敦會	1839	澳門、香港、廣州
赫勃恩 James C. Hepburn	美國長老會	1841	新加坡、廈門
高明 William Henry Cumming	醫藥傳道會	1842	廈門
瑪高溫 Daniel Jerome Macgowan	美國浸信會	1842	寧波
麥卡特 Davie B. McCartee	美國長老會	1844	澳門、廣州
地凡 Thomas T. Devan	美國浸信會	1844	廣州、香港
哈珀 Andrew Patton Happer	美國長老會	1844	澳門、廣州
何斯伯 Henry Julius Hirschberg	倫敦會	1847	香港
詹姆斯 J. Sexton James	美國浸信會	1848	上海
希斯洛蒲 James Hyslop	倫敦會	1848	廈門
泰勒 Charles Taylor	美以美會	1848	上海
楊醫生 James H. Young	美國長老會	1850	廈門
溫敦 William Welton	英國聖公會	1850	福州
懷禮 Isaac William Wiley	美國衛理會	1851	福州

這些傳教士醫生之來華，大多與醫藥傳教會有聯繫，在華醫療活動受醫藥傳教會管理。他們在各口岸開設之醫院，均屬中國各地推行西醫西藥之鼻祖。中國醫藥傳教會在開展醫學教育方面也取得一定成就。

雖然伯駕祇是中國醫藥傳教會的副會長，但由於郭雷樞在醫藥傳教會成立之前即已離開中國，至1879年去世再未重返中國，所以中國醫藥傳教會的日常事務概由伯駕負責處理，伯駕實為中國醫藥傳教會的靈魂。

伯駕在華醫療事業的影響

從 1835 年 11 月開設廣州眼科醫局到 1855 年離開醫局，二十餘年的時間裡，除參與美國對華外交事務外，可以說伯駕把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於醫務活動，其在華醫療事業影響深遠。

第一、解除了一部分中國人的疾病痛苦，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國人對外國傳教士及西醫學的敵視與偏見。傳教士認識到，在清政府實行嚴厲禁教、普通民眾亦有着與生俱來的排外情緒的情況下，祇有醫學是接近中國人並贏得他們信任的最佳傳教方式。伯駕主持廣州眼科醫局期間，有 53,000 中國人接受過他的治療。伯駕之後，眼科醫局由嘉約翰接掌，並更名為博濟醫院。嘉約翰主持博濟醫院近半個世紀之久，由他診治的門診病人達 740,000 人次，曾為 49,000 餘人動過外科手術。⁽⁴⁵⁾到 1934 年博濟醫院成立 99 週年時統計，醫院共接受醫療者達二百餘萬人次，其中接受過外科手術治療者有二十餘萬人，佔總數的十分之一。⁽⁴⁶⁾這些被醫好的中國人，多有寫信表示感謝，以至醫道之名，傳遍各處，這自然有助於消除中國人對外國傳教士及西醫學的敵視與偏見。從伯駕的報告可知，眼科醫局開辦兩年時，伯駕已通過自己的醫術博得了中國人的信任，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伯駕這樣寫道：

中國人中越來越多的人正成為我的朋友。無論我去哪裡，都會被認出。(……)住院病人各類皆有——男的和女的，年輕的和年老的，從一個月的嬰兒到八十歲的灰白頭髮的老人，富裕的和貧窮的，政府官員及他們的臣民。(……)兩位很有前途的年輕人正跟我在一起學習英語，希望自己成為醫生。其他一些人申請醫院職業。其中一個小夥子是畫家林呱(Lamqua)的兄弟，林呱是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的學生。他極為喜愛醫學職業，遺憾的是他本人年齡太大而不能成為一個醫生了。⁽⁴⁷⁾

在另一個報告中，伯駕提到“一批人數相當可觀的官員，其中一些人有很高的地位，他們光顧了醫院。這說明他們對西方病理學知識和藥方的信賴增加了。”⁽⁴⁸⁾可見，伯駕的醫術不僅在中國普通老百姓中贏得了信譽，在清朝政府官員中亦聲名遠播。林則徐曾對伯駕創辦的眼科醫局表示贊許，兩廣總督耆英因伯駕治好了他的皮膚病，特贈匾致謝。而參加《望廈條約》談判的中方代表除趙長齡外，其餘幾位均因本人或是家人曾接受過伯駕的治療，而與伯駕相稔熟。伯駕正是利用了這層特殊關係，在談判中為美國爭取到不少權益。醫療宣教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國人對傳教士的仇視和對西醫術的偏見。《澳門新聞紙》1844 年 7 月 1 日刊載的一篇報導這樣稱到：

中國之人民，平常盡皆恨我等，不欲與我等往來，況又有官府之嚴禁，致我雖用盡法子欲解除中國人恨惡我等之心，惟總不能得之，在我等各項事業之中，祇有醫學乃係中國之人頗肯信之。向來有公司之時，公司醫生雖醫治中國人，惟他們不甚識中國人之言語、品性，況又不是專心，所以就醫者少。然斯時以來，中國人亦頗信歐羅巴醫道之妙手，即已稍肯就醫，至 1805 年，在廣東省城有皮臣醫生種牛痘(……)，後又有李文斯敦醫生到來醫治中國之人，至 1827 年加里治(即郭雷樞)醫生在澳門開設眼科醫館，五年間，醫痊之中國人約有四千餘名……醫痊之人，多有寫信到來致謝，致醫道之多傳遍各處。⁽⁴⁹⁾

對此，著名醫史學家陳邦賢亦說：西式醫院“初立時遭愚民反對，甚有謂外國人挖取小孩心、眼以製藥者；久之，漸得中國人民信仰，外國醫術優於中國舊有，逐漸證明；外國醫院組織完美，尤優於中國之無組織者多矣；外國醫術在中國減輕人民痛苦，救免夭亡，同時中國人反對基督教之偏見亦漸消除。”⁽⁵⁰⁾而“使中國人改變對我們的看法”，消除對外國人的蔑視，承認西方文明的優越性，這本來就是醫藥傳教發起者們所希望達到的目的之一。他們已

經看到“在人民心目中所引起的(對外國人的)偏見和厭惡之感，現在已部分地為本會(中國醫藥傳教會)醫務人員的勞作所消除。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在神的庇佑下，在基督教真理的薰陶和它的宣揚者們無私的努力之下，這種態度不久之後就會完全消散。”⁽⁵¹⁾

當然，傳教士的醫療活動並非一項單純的慈善事業，其真實的目的在於“施醫以調理病人疾病，無非佐傳道之具”⁽⁵²⁾，而是把醫療工作服務於傳教目的，誠如有論者所說：“在第19世紀，甚少有傳教士是純粹抱着教育或醫療的目的來華的，拯救靈魂才是催使他們前來的目標，祇是因着直接佈道的無效，他們才逐漸地引進這些間接佈道法。”⁽⁵³⁾在這裡，醫療被視為福音事業的從屬，救治肉體痛苦的最終目的是求得靈魂的解脫，這是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舉辦醫療事業最主要的出發點。美部會在伯駕行前發出的訓令明確指出，醫學祇有在病人確實有可能被培養成上帝的僕人時，才應下功夫實施。這樣，傳教士開辦的

診所或醫院就成為開展宗教活動的適時場所，伯駕的廣州眼科醫局最典型地體現了這類醫院的宗教性質。在醫局中，伯駕總是不失時機地向前來求診的病人傳佈基督福音，向他們散發《聖經》和傳教單張，尤其對住院病人，往往先花上幾天時間，幫助

他們對上帝產生信心，然後才進行手術。這樣既解除了病人身體的疾病，也使心靈感受到上帝的恩惠。1839年，梁發從南洋歸來後，常到醫院向病人宣道，傳教活動成為醫院的一項必備的內容。鴉片戰爭後，梁發更是長住醫院，在每個病人就診前都



彼得·伯駕在中國的第一例外科手術，割除肉瘤，患者叫阿開(Akae)(油畫)
蘭官〔林呱〕約畫於1836年 耶魯大學哈維·顧順與約翰·海·惠特尼醫藥圖書館藏

要進行一段基督教教義方面的說教。梁發在醫局傳教持續了三年半，參加他講道的人數達 15,000 多人次。對於梁發在醫院的佈道，伯駕曾欣慰地這樣說到：“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過其它善工，祇恢復了這個為上帝所仁愛的僕人的健康，我也已經不枉為一世的人了。”⁽⁵⁴⁾ 伯駕的廣州眼科醫局的開設，確是擴大了傳教士的影響。正如衛三畏所說：“在東方，沒有任何一個傳教機構比這個醫院更為著名，或是在廣泛意義上更為成功。它在這個民族各階層中傳播福音的直接作用是難以估量的。”⁽⁵⁵⁾ 據說衛三畏每個安息日早晨都到博濟醫院向病人佈道，看到醫院如此成功，曾一度做做伯駕開辦醫館，以助傳教。⁽⁵⁶⁾

傳教士開展醫療事業的目的如上，但是否達到了呢？實際情況是，受惠於西醫學治療的中國人，對西醫學及教會醫院表示肯定的同時，卻對傳教士醫生傳佈的基督福音不曾留意。一個突出的例子是，1838 年一位在伯駕醫院病癒的中國人給醫院送來一塊匾額，上書“慈航普濟”四字。⁽⁵⁷⁾ 很明顯，這是一個佛教用語，病人用這樣一個純粹的佛教用語來表達對伯駕及其醫院的謝意，這實際上說明儘管是傳教士及其教會醫院給他解除了肉體的痛苦，但卻沒有導致他的靈魂皈依基督教。為此，美部會警告伯駕“應當警惕避免使醫院成為僅解除身體的疾病，而忽視它們應具有的對於靈魂的益處。”⁽⁵⁸⁾ 伯駕深知自己“世俗醫生的精神太盛，而十字架下的傳教士精神太少”⁽⁵⁹⁾，但他根本無暇向病人講道，這就使得本以宣教為目的醫療工作在傳教方面收效不大，接受救治的病人最終皈依基督者了了無幾。對於醫學傳教，喬納森里斯潘塞認為，“平心而論，他本人並不滿意這種傳播福音的方式，他無非是向病人散發了一些講基督教教義的小冊子，安慰了病人幾句而已。”⁽⁶⁰⁾ 因此，不宜過高評價伯駕的醫療活動給傳教事業帶來的影響。

第二、促進了西醫西藥學知識的傳華。西方醫學自文藝復興以後，開始了由經驗醫學向實驗醫學的轉變。到 19 世紀前後，西方醫學又有了很大發展。首先是診斷學有了很大的進步，雷奈克

(Laennec R.) 發明聽診器，使聽診法、叩診法在臨床上得以廣泛應用；治療方面，解剖學的發展，麻醉術、防腐術以及無菌法的發明，使外科、產科、眼科等手術療法已有了明顯的療效。西方醫學的這些成就大多由新教傳教醫師傳入中國。在這一過程中，伯駕堪稱先驅。

首先是西醫眼科技術的傳入。西醫學輸入中國，來華新教傳教士扮演了重要角色。1820 年，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李文斯敦合作在澳門開設診所，除治療內科等各科疾病外，兼治眼科疾病，此為西醫眼科在我國之起源。⁽⁶¹⁾ 1827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目睹中國人患眼疾者眾多，且有無數盲者流為乞丐，乃特在澳門設一專門的眼科醫院，規模雖小，而成績斐然，四方患者接踵而至求醫。經氏醫治複明及因目盲失業而複能工作者以數百計，幾年間即醫治病人達 6,000 多例。郭雷樞的眼科醫院為伯駕開設廣州眼科醫局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1834 年，伯駕來華。因其專長為眼科，再加上眼疾在中國相當嚴重，而中國傳統的醫術對治療眼病無能為力，乃於 1835 年 11 月開設廣州眼科醫局，以治療眼疾為主，並藉此把西醫眼科技術傳入中國。伯駕實施的第一例眼科手術是治療瞼內翻，其方法是在眼角通過瞼板做一個垂直交叉的切口，以避免凹陷，然後用鑷子（由郭雷樞發明）夾起上眼瞼上部外皮的折痕，用折疊剪刀切掉，留下靠近睫毛 1/5 的皮膚，這樣較之留下大部分外皮，睫毛能更為方便地外翻。手術結束後，傷口的邊緣用針縫合，用帶粘性的繃帶包紮。兩天以後，將縫合線剪開，四、五天後，病人即解除了痛苦。

伯駕在眼科技術上的第二個貢獻是在中國首次做白內障摘除手術。當時中國人眼病中，白內障患者為數不少，它逐漸削弱視力，如果不進行治療，甚至會導致失明。對白內障的治療直到今天仍沒有特效藥，祇有依靠外科手術將導致白內障的雲狀晶體切除。切除術在 18 世紀中期開始在臨床上應用，這一技術對受過眼科專業訓練的伯駕而言，並不複雜。在最初四個月中，伯駕就實施三十例白內障手

術，祇有兩例沒有成功。⁽⁶²⁾

伯駕還治療過其它一些眼病，像沙眼，這是一種傳染性極強的眼病，儘管伯駕從來沒有提及“沙眼”這一名稱，但他屢次提到的“粒狀眼瞼”、“角膜翳”、“慢性眼炎”等，據所述症狀判斷顯然就是指的沙眼。伯駕還介紹了沙眼的治療方法，先用水蛭吸血，然後用硫酸銅液清洗有粒的表面，每天用硫酸銀液作洗眼劑，夜晚用氯化亞汞和大黃。伯駕常提到結膜炎、角膜炎、倒睫症、角膜潰瘍伴穿孔或葡萄腫等。青光眼顯然很普遍，伯駕一年內就提到 10-20 例。此外，伯駕介紹了一些治療眼疾用的藥物，顛茄製劑或顛茄碱、阿托品(atropine)、氯化亞汞、藍色藥丸(blue pill)，他還記錄了馬錢子城在治療眼疾上的效用。

雖然伯駕治療眼疾所採用的方法較之 X-ray、鐳射及放射性同位素等是原始的，但與他同時代的眼科同輩相比是令人滿意的。⁽⁶³⁾對中國眼科學的發展而言，是一項奠基性的工作。繼伯駕之後來華的傳教士不計其數，其中不乏眼科著名者，例如遠赴東北行醫傳教的柯醫師(Dr. Dugald Christie)，他完成了東北境內的第一次白內障手術。他在瀋陽的診所吸引了許多盲人。

其次，伯駕在外科方面創下了中國近代醫學史上的幾項紀錄：1) 割除扁桃腺。1836年，伯駕為編號 2152 患扁桃腺發炎的病人實施了割除扁桃腺手



蘭官〔林呱〕畫的患者王克經(Wang Ke King)(油畫)

約 1837-1838 年 耶魯大學哈維·顧順與約翰·海·惠特尼醫藥圖書館藏

術，這是在中國實施的第一例割除扁桃腺手術。2) 摘除結石。自 1836 年夏，伯駕已開始治療患有尿結石患者，但直到 1844 年才實施他的首例切石手術。這是一位膀胱結石患者，病人是一 35 歲的廣州男青年。這個病人一年前曾來過醫院，試用碎石術沒有成功。這次重回醫院後被告知，祇有通過手術將結

石摘除，他才能康復，最後病人同意了。像通常那樣，手術前幾星期做一些精神和身體方面的準備，給他提供福音書，宣傳基督教理，使其獲得信心後再實施手術。把已分成兩塊的結石通過側切手術取出體外，十八天後病人完全痊癒。這可能是自上古迄至近代，為中國人所實施的第一例切石術。一週後，伯駕又實施第二例切石術。此後，伯駕實施的切石手術逐漸增多，每年都進行幾次，最多的是1851年，竟達九例。⁽⁶⁴⁾ 3) 傳入麻醉術，在外科手術首次使用乙醚麻醉(1847)和氯仿麻醉(1849)。1845年以前，伯駕實施外科切割術都是在無麻醉下進行的，這樣給病人帶來很大痛苦。為了減輕病人的痛苦，伯駕在實施切除手術時嘗試採用麻醉術。伯駕起初用硫醚(Sulphuric ether)作麻醉劑，但因使用硫醚導致一些病人嘔吐而放棄。儘管如此，硫醚麻醉法的應用使醫院在實施外科手術上有重大進步。1847年10月，伯駕又從波士頓買到傑克遜(Charles Thomas Jackson)醫師研製的麻醉儀和一批乙醚，隨同附來的一封信有介紹使用這種儀器的正確方法。伯駕在報告中詳細記下了首次使用乙醚麻醉儀的過程：

初次試驗，我選擇了一位中國人，一個精力充沛的四十九歲的農民，(……)右腋窩處長一steatomata瘤，但是不同於腺，和他的頭幾乎一樣大。他坐在手術臺上，準備躺下。之後他謹慎地吸入傑克遜麻醉儀中的乙醚。我一手握住他的右胳膊，另一隻手在他後面，準備將他輕輕放下。四十三秒鐘，他胳膊的肌肉突然放鬆，並且同時他停止吸入乙醚，進入一種沒有知覺的狀態。他被向後放在手術臺上，(……)他脈搏加快，眼睛呈現歎滯，神情空茫。之後，瘤子被我的高徒關亞杜摘除，並紮住動脈，用了四分鐘。在手術期間沒有最輕微的感覺。(……)在縫合之前，讓傷口暴露在空氣中八至十分鐘。這時乙醚對神經的麻醉作用開始減退，病人對針的刺痛產生明顯的反應，尤其最靠近腋窩的部分，但病人對手術期間的切割一點也回憶不起來。⁽⁶⁵⁾

這種麻醉方法顯然比較安全有效，但伯駕似乎沒有更多應用，因為他很快又被一種新的麻醉法所吸引，這就是愛丁堡產科醫師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首次研用的氯仿麻醉。氯仿麻醉係辛普森1847年1月19日在手術中首次使用，伯駕從一位紐約的朋友那裡得到氯仿和一本辛普森寫的介紹氯仿麻醉使用的小冊子後，因氯仿比乙醚具有令人愉悅的香味，不需要特別的吸入器，尤其氯仿在炎熱氣候中很容易吸收，不久就決定優先使用這種麻醉方法。1849年11月24日，伯駕首次對一例膀胱結石病人使用氯仿麻醉，結果十分成功。儘管氯仿麻醉效用極佳，伯駕使用起來仍十分謹慎小心，“當涉及到肺、心臟或頭部疾病時，從來不使用它。在我使用的八位或十位病人中，沒有不良的後果發生。”⁽⁶⁶⁾

總之，由於麻醉術的應用，使醫生外科手術的選擇範圍大大擴展。1842年後，廣州眼科醫局雖仍以治療眼病為重點，但治療疾病的種類已涉及內外科、骨科、皮膚科、牙科方面，手術包括腫瘤、膀胱結石、乳腺疾病、壞死性骨骼切除等。伯駕即以割除腫瘤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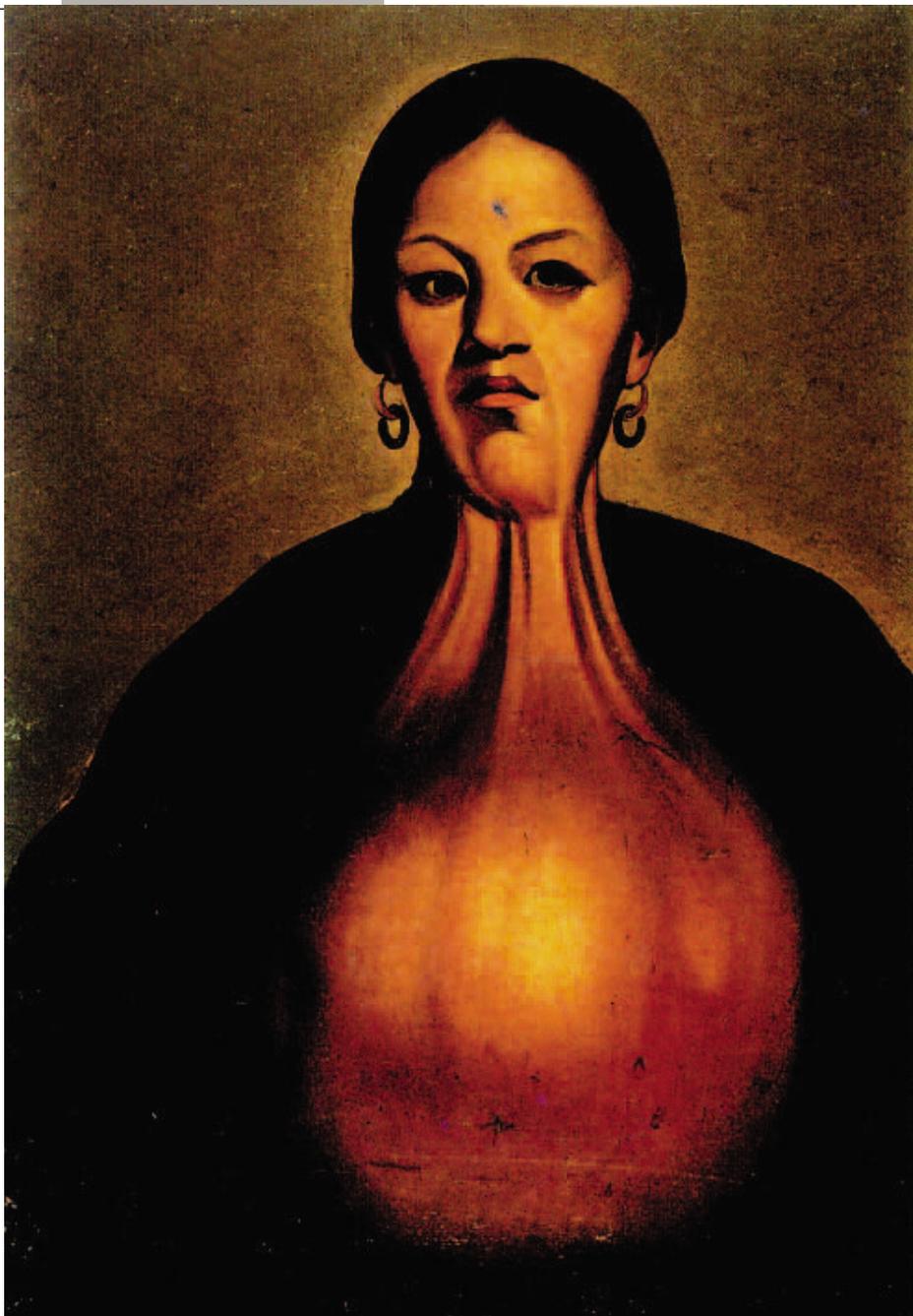
伯駕診治病人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傳播西方醫學知識的過程。除此之外，伯駕還創作有中文醫學書籍，藉以傳播西醫學知識。據說伯駕著有《割除扁桃腺》(1836)、《摘除結石》(1844)、《使用乙醚麻醉》(1847)等書。⁽⁶⁷⁾

伯駕之後，來華醫藥傳教士亦多有著書傳播西方醫學的，其中成就最大者當屬合信與嘉約翰。合信著述的西醫書籍主要有五種：1851年合信編譯的《全體新論》在廣州出版，這是傳教士向中國介紹的第一部比較系統的西方醫學著作，全書包括了外科、內科、婦科、自然哲學等內容，並附圖二百多幅，實為一部解剖學和生理學專著。《全體新論》在廣州一出版，即“遠近翕然稱之，購者不憚重價”⁽⁶⁸⁾，足見其影響極大；1857年出版的《西醫略論》為《全體新論》的續編，附圖四百幅，是病理學和醫療學專著；其它三種《內科新說》、《婦嬰新說》、《內外科新說》為專論。合信的五種醫書，從理論到實踐，較系統地傳播了近代西方醫學知識。正如我國

近代醫學著述家丁福保所說：“合信氏西醫五種，其說雖舊，而於全體、內外科、婦科，已粗備大略”，“此為西醫入中國之始”⁽⁶⁹⁾。合信是來華傳教士中用中文介紹西方醫藥及醫學術語的先驅。⁽⁷⁰⁾這些書對普及我國的醫學教育極具意義，直到今天仍受到人們重視。

嘉約翰從1859年開始致力於著述中文醫學書籍和醫學教材。1859年出版《論發冷小腸疝兩症》和《種痘書》，後者雖祇有短短六頁，卻簡明扼要地介紹了接種牛痘以預防天花最新的和當時最有效的醫學成果及治療方法，對遏制天花在中國的流行起到積極作用；1860年出版《經驗奇疾略述》；1865年出版《奇症略述》；1871年出版五部，它們是《西藥略釋》（有的作《西藥略說》）、《眼科撮要》、《割症全書》、《炎症》（有的作《炎症新論》）和《化學初階》。其中《眼科撮要》、《割症全書》兩書“貢獻於眼科界者甚巨，國內西醫眼科所以能逐漸發達者，不得不歸功於柯氏。”⁽⁷¹⁾

“柯氏”即嘉約翰。1872年，嘉約翰出版《裏紮新編》（有的作《裏紮新法》）和《花柳指迷》，介紹治療梅毒的方法。此外，嘉約翰出版的醫學書籍及醫學教材還有《內科闡微》、《皮膚新編》（1873）、《內科全書》（1883）、《體用十章》、《體質窮源》（1884），1898年專為醫學學生編寫並出版《實用化學》，1899年與尹道之合作出版《病症名目》等。⁽⁷²⁾這些醫學書籍



蘭官〔林呱〕畫的患者楊氏（Yang She）（油畫）

約 1837-1838 年 耶魯大學哈維·顧順與約翰·海·惠特尼醫藥圖書館藏

及醫學教材多由博濟醫院出版，因而時人將博濟醫院譽為“中國新醫學發達的始源”不是沒有道理的。1897年，《集成集》以《博濟醫局》為題的報道稱：

西人素重醫學，故其國醫局動以萬千計。道光中葉，西國善士，始在羊城購地，開設博濟醫

局。後更選次建立分局，以廣博濟之心。計其分局，一在河南、一在連州城、一在連州三江、一在廣寧、一在肇城。自開設至今，計華人從學西醫，已成業者六十四人，將成者二十六人，女醫已成業者十四人，皆能通明西醫。其去年所徵信錄，內開總局診症，共 32,460 名。河南分局診症，共 14,280 名。連州、廣寧、肇城各分局診症，共 37,022 名。另喜加醫生（指嘉約翰）下鄉傳道，沿途施診，共 1,489 名。⁽⁷³⁾

由此可見，博濟醫局不僅設有總局，而且還設有分局；不僅診癒病人為數眾多，而且在培養中國西醫人材方面亦成就斐然。

為傳播西醫學，嘉約翰於 1868 年在廣州創辦《廣州新報》，這是一張用漢字排印、大小為一英尺見方的週報，以介紹西醫西藥知識為主，間或刊載一些國內外新聞。1880 年，嘉約翰又創辦西醫藥雜誌《西醫新報》，該刊為傳教醫生在中國創辦的第一份新醫學期刊，亦為我國最早的西醫雜誌，初為季刊，後改為月刊。關於《西醫新報》的內容及其體例，《中國評論》（*China Review*）曾有所介紹：

此係一種醫學雜誌，專為華人而設。報紙共八頁，大號雜誌格式，有封面及目錄，全屬中文。在發刊辭中，用簡潔文言，說明雜誌之益，醫志尤為重要，並述西醫比較中醫的優越。第一號有短論文十四篇，目錄如下：一、論醫院；二、中國行醫傳道會；三、內科新說；四、方便醫院之情況；五、燙傷之治法；六、真假金雞納霜；七、初起之眼炎；八、大腿截除術；九、上臂截除術；十、肉瘤奇症略述；十一、論血瘤；十二、癲狂之治法；十三、論內痔；十四、論外痔。⁽⁷⁴⁾

至於該刊報的具體內容，從第四期一冊的目錄可見其端倪。其目錄有：論西醫公會聚集之益；論止瘟疫傳染之法；眼球各肌肉功用圖說；西醫用藥撮要略述；胎產奇病略述；論醫痔誤藥肛門生窄；解熱

藥方；長髮藥方；風濕藥方；消頸鬚方；論戒鴉片煙良法；論肺內傷成膿瘡圖說；西國聰耳器圖說；西醫眼科廣告。⁽⁷⁵⁾可惜的是，該刊祇出版了八期即宣告停刊。⁽⁷⁶⁾儘管如此，作為中國最早介紹西醫知識的中文刊物，其對西醫學在中國傳播所作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1887 年，“中國博醫會”成立，嘉約翰被推舉為第一任會長。在兩年的任期內，嘉約翰創辦了英文醫學雜誌《博醫會報》（*Chinese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撰稿者為在華傳教醫生、外籍醫生以及曾在中國工作過的醫生、學者。內容主要介紹西醫在華傳播和發展狀況及各種疾病材料、診治經驗和研究方法，早期還就在華建立甚麼樣的教會醫院、如何開展西醫教育、怎樣解決中西醫辭彙翻譯等問題進行探討。它還從公共衛生學、醫學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中國出現的社會問題。如 19 世紀 80-90 年代，中國社會在討論禁止鴉片問題時，該報集中就禁煙的可能性、禁煙手段和藥方、禁煙效果、煙民素質分析、戒煙所狀況等作了一系列的調查、分析和探討。此外，《博醫會報》還介紹了一些當時國際醫學最新發展動態，如曼松的熱帶病學論文以及對熱帶病學科的介紹，幾乎與英國醫學雜誌是同時的。當然，向西方醫學界介紹和推薦中國醫藥文化也是《博醫會報》的重要內容之一。《博醫會報》是我國醫學雜誌中歷史最悠久的一種，在促進西醫傳播和中西醫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⁷⁷⁾

第三、促進了近代中國西醫院的建立。自 19 世紀開始，中國醫療衛生事業出現了變革性的重大變化，西醫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醫療事業在中國出現並產生愈來愈大的影響，而這種變化發端於西醫院的廣泛建立。西醫院的業務運作，醫療上實行的專業分工及與醫療相配套的護理措施，均優於中國傳統醫學的診斷、醫療、配藥幾乎全由醫生一人負責的統包統攬作法，為中國近現代醫學所借鑒，可以說中國現代衛生醫療機制就是以那時的西醫院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廣州是西醫學最早輸入的城市，也是最早建立西醫院的城市。近代意義上的“醫院”應包括候診室、門診室、住院部、病房、手術室、藥房等，從

這個意義上講，伯駕開設的廣州眼科醫局是 19 世紀中國最早的教會醫院。儘管草創時期的廣州眼科醫局設備簡陋，醫療範圍亦以眼科為主，但到嘉約翰主持的博濟醫院時，它已基本上具備了近代醫院的功能，成為一個多功能的醫療機構了，成為中國歷史最久、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的教會醫院。隨着廣州眼科醫局的建立，尤其是中國醫藥傳教會成立後，以廣州為中心，教會醫療事業擴展到澳門。鴉片戰爭後，隨着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傳教士獲得了隨意到中國各地傳教的自由，教會醫院在各通商口岸甚至內地紛紛建立。傳教士所到之處，均建有教堂和醫院作為教士在該地區駐紮的標誌。除了基督教各傳教會在華開辦醫院外，天主教會也重視開展醫療事業。例如法國天主教士看到偌大的上海僅有仁濟醫院和同仁醫院，遠遠不能應付日趨增多的病人，遂於 1864 年在上海租界外灘街開辦法國醫院，1877 年遷至蘇州河北岸，改稱公濟醫院；1869 年天主教在杭州設聖文森特（St. Vincent）醫院。教會醫院並不局限於大城市，甚至向城鎮延伸。到 1890 年以前，北京通州、張家口、太原、南京、濰坊、成都、福州、北海、常德、長沙、汕頭、溫州、揚州、蘇州、石家莊、保定、青島、南昌、無錫、蕪湖、開封、吉林、瀋陽、西安、蘭州、雲南、貴陽等均有教會醫生涉足。據統計，到 1905 年，教會醫院業已遍及全國二十多個省區，達 166 所；及至 1919 年全國有教會醫院 273 所，具體分佈為：安徽省 7 所，浙江省 16 所，直隸省 20 所，福建省 36 所，河南省 12 所，湖南省 16 所，湖北省 18 所，甘肅省 2 所，江西省 5 所，江蘇省 23 所，廣西省 4 所，廣東省 30 所，貴州省 2 所，山西省 8 所，山東省 22 所，陝西省 2 所，四川省 23 所，雲南省 2 所，東三省 22 所，新疆省 3 所。⁽⁷⁸⁾ 上列數字當然還沒有把獨立藥房（即不在醫院內）計算在內。

這些初始的西醫院，多由教會和傳教士創辦，主要操業人員亦多為傳教士，他們不祇帶來了西方的醫療技術，還帶來了西方醫院的管理辦法。在廣州眼科醫局，為便利前來就醫的病人，伯駕讓醫局看門人每天將標有中英文號碼的竹片發給

前來就診者，就診者則按其到來的先後順序看病。每一位新病人的姓名、疾病狀況、號碼（從醫院開張之日排起）、入院時間等都被記錄下來。這個卡片交給病人，由病人保存直至出院。每位病人的處方都被醫院保留下來，以便為病人再次就診開方提供參考。這就是現今世界上各醫院普遍採用的“掛號制度”的最初形式，它是伯駕在廣州眼科醫局設計創造出來的，可視其為他對中國醫學乃至世界醫學的重要貢獻。此外，伯駕在給病人實施重大手術時，往往要求與病人簽訂醫療協議書，以避免承擔不必要的責任。伯駕在報告中曾詳細記下這樣一份協議書：

我〔病人〕遭受結石痛苦，幾次尋求救助無效。如今我有幸受美國伯駕醫生之恩惠，將使用他的〔手術〕刀把我的結石取出。當治癒時，不僅我一人受其恩惠，而且我的整個家庭都會感激他的偉大的仁慈。山高水深，不可逾越〔意即若結果不幸〕，這和醫生無關，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所定。以免空口無憑，我立字為證，作為證明交由醫生。⁽⁷⁹⁾

這當為中國醫學史最早的一份醫療協議書，它也是由伯駕開創的。此後，這一作法得到廣泛應用，成為手術中一個重要的步驟。

當然，教會醫院的業務運作，醫療上實行的專業分工及與醫療相配套的護理措施，都對中國醫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由於教會醫院醫生和他們本國教會組織保持着密切聯繫，使他們能即時地輸入一些新技術，這使教會醫院在中國的發展保持技術優勢的同時，也使中國醫學日漸受到西方先進醫學知識的影響，推進了中國西醫學發展的進程。誠如近代著名醫史學家陳邦賢所說：

今全國教會設立之醫院，數目與物質兩方，皆較中國自己公私設立者，多而且備；各省著名之教會醫院，有如汕頭英國長老會之醫院、奉天蘇格蘭聯合自由會之醫院、杭州大英醫院、漢口

英國醫院、上海倫敦會教會醫院、美國聖公會之醫院、濟南齊魯醫院、淮陰仁濟醫院、北京協和醫院等，皆資本雄厚，規模極大，馳名全國，每年活人無數，使中國醫學，日漸歐化。⁽⁸⁰⁾

由此可以認為，清末來華的傳教士，尤其是新教傳教士，他們在中國開設的教會醫院對開創中國現代衛生醫療的建制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有人甚至這樣提及：“中國新醫學的來源，顯而易見是教會醫學，這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教會醫學校或醫院造就出來的醫師，大都為教會服務，被教會用為宣傳教義的工具，由此教義宣傳愈廣，教會醫學傳播亦愈普遍了。”⁽⁸¹⁾ 雖說不可認為中國新醫學的發展，全然由教會醫療事業所推動，但他們在此方面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卻是務須正視的。

第四、培養造就了中國第一批西醫學人材。傳教士認為，若要長久廣泛地解除中國人的疾病痛苦，非造就中國醫學人材不可。最初在沒有醫學校的情況下，往往由傳教士醫生以收徒的方式，訓練中國生徒為醫療助手，他們逐漸掌握了西方醫學知識，給教會醫療事業很大幫助，有的甚至獨立行醫，擴大了西醫的影響。在這方面伯駕無疑是先驅者，他是第一位培養中國醫學生的外國醫生。⁽⁸²⁾ 1838年，伯駕在報告中提及已有三名“非常有希望的年輕人”為其助手，其中一位“已經能實施簡單的手術”。⁽⁸³⁾ 此人應為關亞杜(Kwan A-to，即關韜)。關亞杜19歲時由叔父蘭官〔林呱〕引薦，師從伯駕學習西醫。他聰敏過人，在伯駕的指導下，很快就學會了結膜炎、瞼內翻、白內障、腫瘤、腹腔放液穿刺術等眼科及外科手術，一年後即“已成功實施二十多例白內障手術，為病人成功地切除一個重達三英鎊的瘤子。”⁽⁸⁴⁾ 關亞杜的品行及醫術頗得伯駕信任和賞識，伯駕曾這樣評價關亞杜：“作為一名成功的眼科和外科醫師，他的才能、談吐、正直的道德品質，在很大程度上已得到他同胞的信任。同樣，也贏得了外國僑民的尊敬。”⁽⁸⁵⁾ 正因如此，伯駕讓關亞杜參與一些重大手術，那些前來廣州眼科醫局就診的眼科及外科病

人，像結膜炎、瞼內翻、白內障、腫瘤等多數手術都經關氏之手。1844年4月至9月，伯駕因參與顧盛使團外交事務而離開醫院期間，眼科醫局交由關亞杜經營，病人並不因此而減少。四川總督不顧遠隔千里之遙，邀請關亞杜到成都給他做白內障手術。畢華德甚至認為關亞杜“名譽之隆，反在巴氏之上”⁽⁸⁶⁾。“巴氏”即指伯駕。1856年，清政府授予關亞杜“五品頂戴軍醫”，被委派到福建的清軍中擔任軍醫，成為中國第一個西式軍醫。伯駕共培養十多位中國醫學人材，以關亞杜最有成就。維魏林回憶他在廣州醫院裡見到的中國助手說：“這些青年人先前都受過良好的中文教育，後來又學會了英文，他們在醫院裡既是醫生的助手，又是翻譯。我耳聞目睹，對他們的造詣和在治病中顯示的才華，大為驚歎。他們中不少人後來離開了醫院，在廣東省邊遠地區私人獨立行醫。”⁽⁸⁷⁾ 這些最早掌握西方醫學知識的中國助手和醫生，便成為“中國醫學業界的先導人”。⁽⁸⁸⁾

但是，這種培養方式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品質上都無法滿足教會醫藥事業發展的需要。伯駕已有建立醫學校以培訓中國醫學人材的想法，嘉約翰最終使其變成了事實。他發表《醫學教育大綱》，提出開展西醫教育的目的：1) 為一般民眾造就才幹學識俱全的中國醫生；2) 造就教會醫院內的醫生；3) 造就醫學校教員。⁽⁸⁹⁾ 1866年，博濟醫院成立附設在醫院內的“博濟醫學校”，這是中國最早的西醫教會醫學校，由嘉約翰主持。博濟醫學校的學生，既有來自教會學校的學生，也有開業的中醫生。學校人數不多，1868年祇有12名，1870年增收了幾名，1897年在校學生達到103人，到1912年該校停辦時，共畢業學生150人。1879年，博濟醫學校正式定名為“南華醫科學校”(the South China Medical College)，學制三年，並於同年首次招收三名女生入學，成為中國第一所招收女學生的西醫學校。擔任教學工作的除嘉約翰外，中國人黃寬自學校開辦起就參加了該校的教學工作。黃寬為廣東香山人，早年進馬禮遜學校學習，1846年與該校同學容閱、黃勝一起，隨時

任馬禮遜學校校長的布朗 (Samuel R. Brown) 赴美留學，開中國近代留學美國之嚆矢。黃寬在美兩年後，轉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1857年學成回國，成為中國第一個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的醫學碩士。回國後，黃寬先到廣州金利埠仁濟醫院當醫生，結識了嘉約翰。黃寬因醫術高明，深得嘉約翰的器重。博濟醫院開業後，黃寬便經常到博濟醫院協助嘉約翰工作，如疑難病的診治、重大手術的實施等，這些為黃寬到南華醫科學校承擔教學工作奠定了基礎。黃寬在南華醫科學校擔任的課程有解剖學、生理學和外科學。嘉約翰在編撰教材和講義時，同樣得到黃寬的極大幫助。1887年，香港西醫書院成立，嘉約翰把南華醫科學校的部分學生轉到該校深造，其中即包括中國近代民主主義先驅者孫逸仙博士。

南華醫科學校培養了中國第一代西醫醫生。嘉約翰任校長期間，一共畢業了大約100名西醫學生，肄業離校的有50名。這150多名中國西醫醫生，除大部分在廣東各地行醫外，還有的到其它省區開展醫藥事業，對西醫及西方近代科學在中國傳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⁹⁰⁾1904年南華醫科學校擴建後改稱華南醫學院，1914年該院又附設成立護士學校，1917年由廣州博醫會接管，1930年改由嶺南大學接辦，新中國成立後併入廣州中山醫學院（今天中山醫科大學的前身）。

自南華醫科學校創辦以後，醫學教育逐漸發展起來。許多教會醫院紛紛設立附屬醫學校，培養醫學人材。隨着教會大學的興起，許多教會大學都設立了醫學院。到19世紀末，又出現了專門的醫科學校，自1880年麥肯齊 (John Kenneth Mackenzie) 醫生在天津建立中國第一所近代醫科學校後，一些條件較好的醫科學校不久即在廣州、上海、南京、安慶、福州和北京等地建立起來。⁽⁹¹⁾同時，各教會醫院還出版一些醫學書籍及教材，如博濟醫院就前後出版過四十二部醫學書籍及教材，對傳播西醫學知識、培養醫學人材貢獻良多。正如醫學史家陳邦賢所指出的：“各醫院之功績不獨為人治癒疾病，減少死亡率，而訓練甚多中國助手、翻譯西國醫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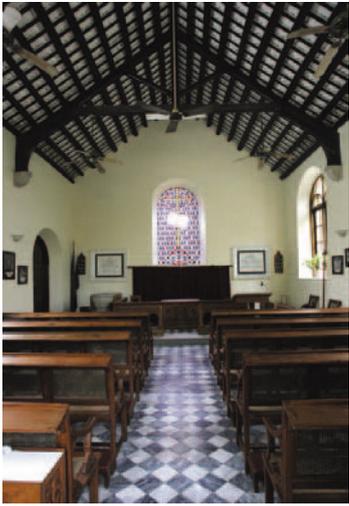
籍為漢文、傳佈西國醫學知識於中國，其功亦不小也。”⁽⁹²⁾因此，“站在中國現代化這一角度，評估基督教的關聯與影響，無論在19世紀早期以至後世明朗可見的成就，當必優先想到西方醫學的輸入，教會醫生在華的貢獻，中國醫療主體的嬗變，醫學教育制度的建立，西醫診所醫院的擴展，中國西醫醫生的輩出。”⁽⁹³⁾

【注】

- (1) 魏外揚：〈醫療宣教的先驅——伯駕〉，臺灣《校園雜誌》1966年10月號。
- (2) 林子昇：《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224。
- (3) 趙璞珊：〈西洋醫學在中國的傳播〉，《歷史研究》1980年第3期。
- (4) 董光壁：《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頁1064，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 (5)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頁185，商務印書館，1936年。
- (6) 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 p. 32, New York, 1924.
- (7)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 pp. 165, 170-171, London, 1839.
- (8) Charles Gutzlaff, *Chinese Medical Mission*, p. 2, Nisbet Lco, 1856.
- (9)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p. 167, Lanham, Md. & London, 1996.
- (10) (11) (英)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頁159-160，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12) 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 p. 106.
- (13) (16) 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頁245，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 (14)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p. 16.
- (15) Wong, K. C.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173, Shanghai, 1936.
- (17) Murray A. Rubinstein, *op. cit.*, p. 222.
- (1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 p. 276.
- (19) Michael C. Lazich, *E. 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n'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p. 105,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0.
- (20)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4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21) *Missionary Herald* 31:31 (January 1835).
- (22) Edward H. Hume, "Peter Park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nesthesia into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 1:671 (1946).
- (23)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op. cit.*, p. 121.
- (24) 1818年，英國愛丁堡大學校長貝爾德 (Baird) 要馬禮遜幫助調查中國人的疾病狀況，馬禮遜委託李文斯敦代辦此

- 事。經過李文斯敦的調查發現，中國人所患疾病中，以眼病最多。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I, pp. 15-16, London, 1839.
- (25)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45.
- (26)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V, p. 463.
- (27)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op. cit.*, p. 41.
- (2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I, pp. 634-637.
- (29) 譚樹林：〈美國傳教士伯駕與西方國際法首次傳入中國〉，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55期（2005年夏季卷）。
- (30) (31) (3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I, pp. 302-303; p. 301; p. 370.
- (33)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206.
- (34) Bridge to Anderson, Canton, May 2, 1836.
- (35) (36) (37)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op. cit.*, p. 134; p. 135; pp. 135-136.
- (3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pp. 37-40.
- (39) Wong, K.C.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362, Shanghai, 1936.
- (40)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一，〈英醫合信氏傳〉。
- (41)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pp. 411-412.
- (42)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75.
- (4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p. 466.
- (44) 魏外揚：〈醫療宣教的先驅——伯駕〉，載臺灣《校園雜誌》1977年10月號。
- (45)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op. cit.*, p. 109.
- (46) 《中山紀念博濟醫院九十九週年年報》，1934年7月。
- (47)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op. cit.*, pp. 132-133.
- (48) 劉聖宜、宋德華：《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頁60，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
- (49) 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頁242-243。
- (50)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頁189-190。
- (51)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 p. 190.
- (52) 李剛己：《教務紀略》卷四。
- (53)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頁72，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88年。
- (54) 魏外揚：〈醫療宣教的先驅——伯駕〉，載臺灣《校園雜誌》1977年10月號。
- (55)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p. 119, Boston and Chicago, 1972.
- (56)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LL.D.,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 p. 418,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
- (57)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p. 96
- (58)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71.
- (59) (60) (美) 喬納森·斯潘塞著，曹德駿等譯：《改變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0年，頁41；頁51。
- (61) 畢華德：〈我國西醫眼科之起源及現狀〉，載《中華醫學雜誌》第16卷第5期（1930）。
- (62) (63) (64) (65)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147; p. 148; p. 161; p. 164.
- (66)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op. cit.*, p. 81.
- (67) 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頁580，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年。
- (68) 王韜：〈衡華館日記〉，轉引自劉聖宜、宋德華：《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頁250。
- (69) 〈歷代醫學書目序〉，轉引自劉聖宜、宋德華：《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頁249。
- (70)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269.
- (71) 畢華德：〈我國西醫眼科之起源及現狀〉，載《中華醫學雜誌》第16卷第5期（1930）。
- (72) *Chinese Recorder*, Vol. V, p. 143.
- (73) 《集成集》第二冊，光緒二十三年（1897）四月十五日，頁16。
- (74) 馬伯英等：《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頁397-398，文匯出版社，1993年。
- (75) 蔡恩頤：〈民元前後之中國醫藥期刊考〉，《中華醫史雜誌》1953年第3號。
- (76)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op. cit.*, p. 134.
- (77) 梁碧瑩：〈嘉約翰與西醫學在中國的傳播〉，載陶文釗、梁碧瑩主編《美國與近現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 (78) 王志信：《道濟會堂會》，頁10-11，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6年。
- (79)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162.
- (80)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頁190，商務印書館，1937年。
- (81) 翁之龍：〈中國的新醫學〉，《文化建設》，第1卷第2期。
- (82) (84)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150.
- (83) *Missionary Herald* 34:339 (September 1838).
- (85) 馬伯英等：《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頁350-351。
- (86) 畢華德：〈我國西醫眼科之起源及現狀〉，載《中華醫學雜誌》第16卷第5期（1930）。
- (87)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p. 140.
- (88) 〈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頁162，轉引自劉聖宜、宋德華：《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頁60。
- (89) 陳明齋：〈中國百年來新醫學之進展及其近狀〉，《新中華》第2卷第9期（1934年5月），頁31。
- (90) 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頁18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91)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p. 150-151.
- (92)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頁190，商務印書館，1937年。
- (93)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91，臺北，宇宙光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

[說明] 本文所提供的照片影印件，均取自(美)多米尼克·士風·李著、李士風譯：《晚清華洋錄——美國傳教士、滿大人和李家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特此致謝！



馬禮遜小教堂內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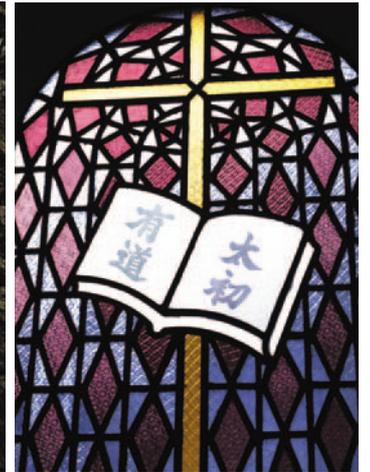
澳門“世遺”之一景：馬禮遜小教堂



基督新教墓園中之錢納利墓（左）



馬禮遜墓誌



小教堂內講壇窗飾



瑞典的澳門史家龍思泰安息其中



馬禮遜一家人在此安息



墓園為澳門留下了 19 世紀的憩靜色調



由馬禮遜小教堂步下引階所見



馬禮遜小教堂內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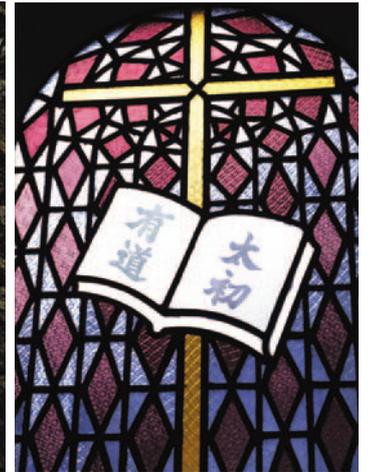
澳門“世遺”之一景：馬禮遜小教堂



基督新教墓園中之錢納利墓（左）



馬禮遜墓誌



小教堂內講壇窗飾



瑞典的澳門史家龍思泰安息其中



馬禮遜一家人在此安息



墓園為澳門留下了 19 世紀的憩靜色調



由馬禮遜小教堂步下引階所見